

中华帝国的
最后一个遗老

辜鴻銘

孔庆茂 张鑫 编



中华帝国的
最后一个遗老

辜鸿铭

孔庆茂

张鑫

编



中华帝国最后一个遗老——辜鸿铭

作 者：孔庆茂 张 鑫

责任编辑：陆元昶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滨海县第三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200,000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3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1020-8/I·970

定 价：12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前言：怪诞的思想家

—— 辫子长衫下的辜鸿铭

孔庆茂 (1)

辜鸿铭自述

辜鸿铭 (24)

张文襄幕府纪闻

辜鸿铭 (78)

弁言/南京衙门/不排满/虎门轶事/曹参代萧何/大臣
远略/上流人物/书生大言/五霸罪人/清流党/孔子教/
新算学/孟子改良/践迹/务外/生子/为人/公利私利/
权/廉吏不可为/爱国歌/半部论语/理财/王顾左右而
言他/官官商商/爱官/亡八蛋/禁嫖赌/倒马桶/贱种/
贵族/翩翩佳公子/庸言庸行/不吹牛屁/颂词/马路/大
人有三待/不问民/真御史/国会请愿书/马拉马夫/夷
狄之有君/烂报纸/读书人/督抚学堂/女子改良/高等
人/费解/不解/狗屁不通/看画/华侨/照像/发财票/卖
穷/不枉受穷/叶君传/赠日本国海军少佐松枝新一氏

序/士说/在德不在辨/自大/依样葫芦/学术/风俗/政
体/看招牌/爱才/不自贵重/不拜客/自强不息/犹龙

国学辜汤生传	赵凤昌 (131)
北大感旧录·辜鸿铭	周作人 (137)
辛亥革命时的辜鸿铭	蒋慎吾 (139)
回忆辜鸿铭先生	罗家伦 (141)
辜鸿铭在北大 (节选)	冯友兰 (146)
记辜鸿铭	胡适 (148)
辜鸿铭	林语堂 (154)
辜鸿铭集译《论语译英文》序	林语堂 (159)
辜鸿铭先生轶事	梁实秋 (161)
辜鸿铭先生的思想	袁振英 (163)
辜鸿铭先生之欧洲大战观	震 瀛 (170)
记辜鸿铭先生	震 瀛 (173)
补记辜鸿铭先生	震 瀛 (178)
记辜鸿铭	贻 (181)
战争和出路	震 瀛 (184)
追忆怪才辜鸿铭	周霁亮 (187)
辜鸿铭	温源宁 (195)
我所知道的槟城 (节选)	凌淑华 (198)
辜鸿铭比较中西文化	吴相湘 (202)
辜鸿铭脚踏中西文化	任荷生 (217)
辜鸿铭在德国	嗣 銮 (224)
辜鸿铭	林斯陶 (227)
略谈辜鸿铭	沈来秋 (229)
记辜鸿铭	马伯援 (241)
日本“辜鸿铭热”的内幕	黄兴涛 (243)
与辜鸿铭书	[俄] 托尔斯泰 (248)

[附] 辜鸿铭祝托尔斯泰八十寿诞文

托尔斯泰与辜鸿铭	吴 文 (254)
辜鸿铭访问记	[英] 毛姆 (261)
辜鸿铭论	[丹麦] 勃兰得斯 (269)
辜鸿铭	[日] 清水安三 (278)
辜鸿铭学术年表	孔庆茂 (292)
辜鸿铭研究资料目录	孔庆茂 (306)

前言：怪诞的思想家

——辫子长衫下的辜鸿铭

孔庆茂

在近代中国，有这么一位怪人：

——生于南洋，长于西方，根却扎在东方故土。

——精通西方数国语言，获得许多西洋博士学位，却热衷于向西方鼓吹中国文化、儒学经典。

——西方的洋枪洋炮迫使国人谋求富强，以御外侮，他却坚信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中国文化可以拯救世界。

——热爱中国，却不见容于世，满腹学问，却又落落寡合，处处维护中国的主权与尊严，常常又遭国人的嘲讽与冷落。

——满腔热血，一副冷脸，善骂成为他的个性。用外语骂洋人，用中文骂国人，地位愈高，愈受他骂。从权倾一世的慈禧太后，到李鸿章、袁世凯一路骂来，只有他的夫人、小妾与歌妓例外。

——处处反潮流，与社会对着干，众人热心洋务，他偏讲儒学；众人呼唤民主，他偏拥护专制；众人主张妇女解放，他却赞成纳妾缠足；众人长衫辫子，他西装革履，到众人西装革

履时，他反而长衫辮子以“遗老”自居。

——既反对军阀，又反对革命，眼界开阔，思想守旧，愤世嫉俗。旧时代对他畏而弃之，新时代对他忌而远之。年愈高，遇愈穷，直至去世。

——在国内饱受冷眼，成为顽固与守旧的典型；在国外却颇享盛名，欧洲人把他看做东方文化的圣哲，他的著作成为当年欧美大学中国哲学的必读书或参考书。他是大批评家卡莱尔、阿诺德的高足，大文学家托尔斯泰、泰戈尔的朋友，是西方人心中东方文化的代言人，沟通东西文化的使者。

他，就是辜鸿铭！

在人们的印象中，辜鸿铭是一个头戴瓜皮小帽，身穿长衫，入民国后脑后仍拖着一根长辮的满清遗老，是一个热心拥护男人纳妾、女人缠脚，积极参与复辟的顽固派，“辜鸿铭”三个字在近代仿佛成了一切守旧和怪诞的代名词。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怪诞外表下炽热的爱国之情，冷静的批判态度，以及他向世界弘扬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

在近代中国这个悲剧的大舞台上，辜鸿铭是以喜剧脸谱出现的悲剧角色。

辜鸿铭生活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中国近代社会特殊的社会条件产生了特殊的人物群。

摆在近代中国人面前的突出的问题，是民族的兴衰存亡。在帝国主义虎视眈眈的觊觎与洋枪巨舰的武力威胁下，中国应该怎么办？

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后，最早睁开眼睛看世

界的思想家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林则徐、魏源开始向西方寻求御侮图强之道。魏源根据林则徐主持编纂的《四洲志》、《华事夷言》的方法，编纂了在中国和东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世界史地巨著《海国图志》。魏源以“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的爱国精神，通过客观冷静的分析，总结性地提出反抗侵略的两大纲领，就是“以夷攻夷”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学习他们之所以富强的方法，来抵御他们的侵略。当然，这里的“师夷长技”还只是指学习军事方面的战略战术，学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养兵练兵之法，没有也不可能有更深层的内容。但魏源也同龚自珍、林则徐一样，认识到那个时代存在的深重危机，认识到封建社会改革内政的必要性，只有改革社会才能增强国家力量。他指出不能单靠武器装备抵抗外敌入侵。从这样的先进观点出发，魏源对当时的学术风气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对当时学术上占据统治地位而又远离社会实际烦琐考据的“汉学”，以及同样远离实际空谈心性的“宋学”都提出批评，倡导经世致用——“以实事求实功，以实功从实事”——的学术思想。注重以联系社会实际的态度、方法治学，要人们走出书斋，走向社会，所学于社会要有所裨益。他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新思想，在当时的社会具有新的原则指导意义。^①成为以后许多进步人士为拯救中国、抵抗侵略而寻找真理的指针。正如王韬所评价的，“师长之说，实倡先声”^②，而且，这个理论奠定了以后中国人思潮的主流：为了抵御西方，就先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的东西。开了近代风气之先。

身处东南沿海的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在其著名的《校邠

① 李泽厚《十九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研究》，见《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② 《扶桑游记》。

庐抗议》中也说：“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如耻之，莫若自强。夫所谓不如，实不如也。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道在实知其不如之所在；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必求其所以如之，仍亦存乎人而已矣。”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的方针，提出要博采西学，努力学习资本主义的各种科学技术知识。冯桂芬比魏源更进一步的认识是第一次具体明白地提出内政、外交、军事、文化全面改革的必要性。他认为在军事、内政等多方面中国都不如西方，即“四不如夷”：“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提出一系列改革弊政的主张。他虽然还没有明确的资产阶级改革的思想，但是已朦胧地感到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政治制度等实际的改革内容。冯桂芬承上启下，影响到洋务派与改良派。洋务运动只是吸收了他思想中向外国人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军事武器而已，他们对真正的中国内政的改革并不关心。但洋务运动在客观上却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重要的是，洋务运动中许多年青人被派出国外留学，他们亲自接触到资本主义的富强，深切感到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长处，探讨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的深层原因。他们已不满足于洋务运动单纯学习军事、科技的内容，也不满足于以封建官僚体系“官督商务”制度来办近代企业。看来，中国富强自立还需另找出路，就提出了更进一步向西方学习的主张。资本主义改良主义作为一种时代思潮已经萌芽。王韬、马建忠、薛福成等人就是其突出的代表。

王韬、马建忠、薛福成是近代最初的一批改良主义思想家。他们看到洋务运动中的不足，提出发展工商业的要求。被李鸿章派到欧洲学习的马建忠，在《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中说：

“以知近百年西人之富，不专在机器之创兴，而其要领

专在保护商会，……忠此次来欧一载有余。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①

他们看到西方列强正是以商品资本输出的经济侵略来掠夺中国的，坚船利舰都不能抵挡住这种经济上的侵略。只有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才是应走的富强之路。围绕着国家应如何保护、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核心问题，他们提出许多改革主张，从兴办工业到国家预算，从交通运输到厚俸养廉，触及了一系列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各方面的具体经济问题。如马建忠、陈炽、何启、胡礼垣要求增加外国商品关税，收回海关自主权。^②薛福成力阻李鸿章任命英人赫德为总税务司等都表现了这种爱国要求。为了发展工商业，与之有关的矿业、交通运输业都要大力发展。这种重商的思想打破了中国传统重农轻商的观念。薛福成说：“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特商为创国造家开物成务之命脉……四民之纲者，商也。此其理为从前九州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西洋创此规模实有可操之券，不能执崇本抑末之旧说以难之。”^③这种商业至上思想的资本主义观念赋予西化以更加充实的内容。

但是封建社会的体制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不相适应的，所谓的官督商办，实质上是加在资本主义经济上的沉重的封建主义上层建筑镣铐。官办企业是“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④对商办企业也是不断压制、阻挠、控制，民族工商业得不到什么真正的保护。因此，工商业者希望有干预政治的权力，维护

① 《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卷二。

② 见陈炽《庸书外篇·税则》，何启、胡礼垣《曾论书后》。

③ 见薛福成《庚子四国日记·英吉利商务辟荒地说》。

④ 《张文襄幕府纪闻·官官商商》。

自己的经济利益。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郑观应、陈炽等思想家替他们说出了其愿望。郑观应、陈炽一方面要求工商业应“不由官办，专由商办”，“全由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以摆脱官府的种种束缚，另一方面强调立“商部”、定“商律”，从政治和法律上保障“商”的权利。这也就渐次接触到议院的问题。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介绍进来，大加赞扬，成为救亡之道与富强之本。比如“泰西富强之道，在有议院以通上下之情，而他皆所未”^①；“议院为欧洲近二百年振兴根本，……议院为其国国政之所在，即其国国本之所在”^②；“泰西议院，……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莫善于此”^③；“泰西各国咸设议院，……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必强，……制治固有本也。”^④ 何启、胡礼垣是最突出的代表：“民心之不服，由于政令之不平，今既使民自议其政，自成其令，……何不服之有？”“商贾中有品行刚方行事中节者，人必举为议员，……以办公事。”“新政之行，必设议院，而议员俱由民公举者，诚以成大事必用巨资，用巨资必行贷款，而借贷之财出于民，民之听信唯议员也。”“今之法令宜若何，俱由议员订定，将来法令若有再改，亦经议员商酌，是议员已操政令之实矣。而行此政令，其责在君，君则命官以治焉。”^⑤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自序》中概括说：“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

① 陈炽《创设议院以通下情》。

② 宋育仁《泰西各国采风录》。

③ 《庸书·议院》。

④ 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

⑤ 以上见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论》，《新证议论》。

物畅其流。……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

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改良维新思想达到发展的顶峰。一八九四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惨酷的失败和清政府的软弱腐败，空前迅速地把中国进一步推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重灾难之中。深重的民族危机激起了广大民众和社会各界人士强烈的愤怒和同仇敌忾的决心，出现了救亡图存的爱国高潮。在社会下层，劳动人民和城市贫民在全国各地不断爆发捣毁教堂、杀不法洋人的“教案”，反洋教斗争到义和团运动达到顶峰。在社会上层，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也产生了一个飞跃，从思想的宣传阶段上升到实践的行动阶段。康有为作为维新变法的领袖人物，通过他的著作与演讲，向社会大力宣传，他在保国会上的演说：

“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忍言者也。”

在当时人们的心中引起强烈的共鸣。梁启超、谭嗣同等互相呼应。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上的政论尖锐、痛切、激烈，富有强烈的鼓动性，“变亦变，不变亦变”成为士人的共同呼声。《时务报》“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维新派的各种学会遍布大半个中国，尤以南方各省为多，如上海一带除《时务报》外有反对妇女缠足的不缠足会、女学会；江苏的苏学会，雪耻学会；两广的粤学会，《知新报》；湖南谭嗣同、唐才常办的南学会和《湘报》，福建的闽学会，江西的赣学会和经济学堂。西北有陕西的陕学会等等。据统计，到一八九八年各种自发组织的学会、

报馆、学堂合计三百余所。康有为连续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时事，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后，即着手变法。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下“明定国是”诏，实行变法。虽然变法遭到慈禧的镇压而只有一百零三天，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

这是近代社会向西方学习与“欧化”的一般轨迹。与维新改良的思潮截然相反，一批顽固的封建大官僚、地方豪绅，反对任何向西方学习的言论和活动。这部分人多是对欧洲社会一无所知的夜郎自大之徒，凭着盲目排外的封建本能，对欧美的东西一概排斥，哪怕是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不例外。他们妄想凭借三纲五常的“圣道”使国家“强大”起来。对于中国的贫弱失败的现实，褚成博说，变法应先变心，改变当今“人心不古”的局面，“当今之世，非无法治之患，实无人心之患”。^①李秉衡认为补救之道“总以正人心、培国脉为本”。^②大学士徐致祥上奏，请求皇帝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举行经筵”，“延访天下真儒、深明朱子之学者，置诸左右，使之朝夕献纳，启沃圣心”，那么“唐虞三代之隆不难矣”。^③对康梁的维新变法，持绝对的反对态度。荣禄说“祖宗之法不能变”。曾廉说：“一代之法，莫不与一代相终始。凡开国之初，其祖宗定祸乱而致太平者，率非后世之所能及。……凡子孙欲革先人之法，则其祸乱必尤甚于未革之世。”^④他甚至认为祖宗之法，到后世虽然产生种种弊端，也不应轻易改变，坚持祖宗之法，则“虽危而犹可不至于亡”，如果大改祖宗之法，“则其颠覆可立待”。^⑤孔灏大

① 《变法宜先变心折》，《坚正堂折稿》卷二，18页。

② 李秉衡《奏陈管见折》，《李忠节公奏议》卷十，8页。

③ 徐致祥《请举行经筵折》，《嘉定先生奏议》卷下30页。

④ 《忠敬文论》，《麒麟集》卷七下。

⑤ 《齐鲁执政疾迟论》，见《麒麟集》卷七下。

骂康有为“辩言乱政，莫此为甚”。^①他们认为西学、新学不啻为洪水猛兽，认为提倡新学、西学是“举中国尧舜周孔亘古相传之道术，一旦弁髦弃之”，^②只有八股“制义”是“正学”。曾廉说“读书、作人、为文止是一道，必其人博通而正大，笃实而宏远，而后其文字自有儒者气象”。当今的急务不是要提倡西学、新学，而“必自正制义始，制义正而后心术端，心术端而后人才兴”。^③他们对即使象洋务派那样学习西方技术都不赞成，更不要说民权、议院、君主立宪了。

除了这截然相反的两极之处，还有一种在当时比这两种观点影响都大的一派，即以辜鸿铭所追随二十余年的府主张之洞为代表的“中体西用”的理论。作为洋务大吏，张之洞看到不向西方学习，对清代社会作一些局部的改良是不行的，他在著名的《劝学篇》中提出了讲求农工商学、发展近代工业等等一系列主张。但是他认为“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④，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根本，不能动摇，在这个根本前提下才可以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学以及先进技术，“夫所谓道者、本者，三纲四维是也……若守此不失，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哉”。^⑤有了本体之后，西方社会的有益之处，如兴办工商业，发展军事工业，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皆可为我所用。这就是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理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乎经义。为其心圣人之心，行至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

① 《驳保国会章程》，《觉迷要录》卷四。

② 屠仁守《奏陈变通书院章程疏》，《屠光禄奏疏》卷四，25页。

③ 曾廉《与诸生徒论制义》，《麒麟集》卷十八。

④ 《劝学篇序》。

⑤ 《劝学篇外篇·变法第七》。

为圣人之徒也。”^①对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倡导的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张之洞是大为不满的，多次向他们提出责难。“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②按照他的思想：“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底，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③张之洞的目的是要为清朝统治者寻找一种既能稳固其统治，又能富国强兵的道路。所以赞同康、梁维新派的光绪皇帝对此书也大为欣赏，赞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故而命各省督抚学政人手一册，广为刊布，此书“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胥而遍于海内”。

二

以上简单勾勒的就是辜鸿铭出现的时代背景。辜鸿铭祖籍福建同安，一八五七年七月十九日出生于英属马来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之家，十岁左右即随义父英人布郎到英国留学，先后在英、德、法留学十一年，获得文、理、工、哲等多科文凭，一八八五年回归中国，入张之洞幕府，为张氏的洋文秘书。从启蒙教育一直到博士，他接受的是一套完全欧洲式的全过程的教育。从他的所接受的教育来看，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西方人，应该是一个眼界开阔赞成欧化的人物，然而，令人惊奇地，他对向西方学习却大加反对，不仅反对改良派的变法维新，甚至对洋务运动也多方指责，其论调简直与一个对西方茫然无识

① 《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

② 《劝学篇·明纲第三》。

③ 《劝学篇·循序第七》。

的顽固派一模一样。如果我们从以上的中国近代文化背景的叙述中来看，从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直至他去世，他都始终不渝地坚持反对欧化的观点，从没有一点改变与妥协，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怪现象。

辜鸿铭无疑是一个政治上守旧者，但是像他这样生长在西方直接接受西方教育的人来说，既无旧的政治地位，又无旧的学问根柢可守，笼统地说他是守旧者、顽固派，为他“定性”，似仍过于简单。辜鸿铭的特殊性就在这里：虽然他的后半生在中国度过，他的思想体系毋宁说是属于西方的，是属于西方理论批评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研究，不应当把他局限于中国近代社会，把他仅放在洋务、改良以及辛亥革命的对立面来作为顽固守旧者的批评，而应该同时把他放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来观察，看看他是如何成为一个顽固守旧人物的，他的思想的形成又说明了什么？

辜鸿铭在英国受启蒙教育和中学后，入德国在柏林及莱比锡几所大学读工学和哲学等学科，一八七七年又获得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文学硕士，又曾在牛津读过一段书，然后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辜氏在西方读书的时期，正是西方文化守成主义的盛行期，如纳斯钦、爱默生、阿诺德、纽曼、卡莱尔以及其他英国浪漫派诗人的学说正是走红的时候，辜氏在英、德、法学校中，有些是亲承其教，如卡莱尔、阿诺德，有些是私淑其学，如纳斯钦、爱默生以及浪漫诗人柯勒律治、华兹华斯。深受这些文化守成主义理论的影响，决定了他的思想倾向。

西方文化守成主义固然有其反现代化的保守一面，但又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不少积极的意义。一七八九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辟了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新时代，它用暴力摧毁了封建统治，为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法国革命的鼓舞下，欧洲其他国家反封建斗争高涨，